

序

劉心武

捷生囑我為他的這個小說集作序，我一口答應下來。當時覺得有許多話可說。因為雜事獨集，直到這兩天才提筆（實際是敲鍵）為文，卻沒想到，忽然失語。

這失語，細想想，倒是個好現象。

無論是捷生的寫作狀態，還是我想起他來的心情，所謂「忽然道不出」，都好比奔騰的溪流，水量飽滿，一路歡唱，卻忽然似乎消失，且慢歎息其未能泄江入海，須知它們都並沒有終結，更不可能枯涸，而是泄入地表深處了。據說，從地面泄入地下的暗流潛河，往往比仍在地面流淌的明溪流湍更雄闊。明、清以降的文人筆記，常載某內陸溶洞，深入其內探險，竟找到終於通海的憑據，其文往往簡約，而喚起的聯想，卻極其豐富。

我長捷生十歲，忘年交卻已近三十年。過去聽到「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」的話頭，人世滄桑感立刻湧聚心頭，現在卻覺得十年算得什麼，一個生命堅持一種活法，穿越十年未必多難，達到忘年之境，才真有尊嚴，也才能創造出真價值。

我於2006年7月赴港參加書展，邀請方要我報個演講題目，我報的是《邊緣寫作》。主持我那場演講的名士，以為我要說的，只是比如說我這些年既寫小說又寫隨筆，更寫建築評論並進入《紅樓夢》研究範疇，是一種「跨體裁跨領域」的書寫，後來聽了我一番發揮，才和現場的二百多名聽眾一起，知

道我想訴說的，倒是另外的意緒。

自1990年以來，我是一種邊緣生存的狀態。這既是被動的，也是主動的，仿佛一條魚被「清查」後，判罰為「把他丟到水裡去」，誰知那魚本來就無意爭奪岸上的名位利祿，「丟到水裡」，恰中心懷，正好遨遊江湖，逍遙自得。人在邊緣，但未出局，仍能從事邊緣寫作，這些年出了很多本隨筆集，有一本叫《邊緣有光》，概括出了一種活法，一種狀態。

所謂邊緣生存、邊緣寫作，不是沒有政治理念、社會關懷，而是不搞政治，不自以為是救世豪傑，生存按自己的性格意願，寫作按自己的審美趣味，哪方勢力也不要來揮動指揮棒，對一切非我自覺自願的強制均進行抗爭，以達到徹底的個人化、個性化。當然，一己的政治傾向、政治情感、社會關注、人文情懷，會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所書寫的文字中，而文字本身，是努力地超越，體現出生命的掙扎，也就在那份掙扎中，去展現出一種獨到之美。

捷生彙編到此書中的文字，依我看來，正是一種邊緣生存者的邊緣寫作。社會有中心，這是人類無可遁逃的群體生存結構。中心既不可避免，則希望中心能組織好整個的人類「生存圓幅」。個人有時是或被「中心」拋出，如歷史上的屈夫子，因怨懟而騷泄，構成奇詭的詩文，有時則是主動「離心」，如歷史上的陶淵明，則能形成豁悟曠達的美妙文字。經歷史的篩汰，證明著一點，就是一個時代的中心文學，往往都成為化石，徒具資料價值，而那些當時屬於邊緣的文學，倒很有些成為了常綠之樹，成為世代讀者的必賞風景。其實曹雪芹與《紅樓夢》就是邊緣生存和邊緣寫作，雖經磨難摧殘，終於還是如米羅的維納斯一樣，「斷臂」帶傷流傳到了今天，成為一個璀璨的範例。

把自己和捷生都納入邊緣生存與邊緣寫作的範疇，本不必顧忌，但舉出了屈原、陶淵明、曹雪芹為前例，卻未免有狂妄之嫌。近年來我為文時常引袁枚兩句詩：「苔花如米小，也

學牡丹開」。庶幾可以多少消化一些世人的誤解。不過我要在這裡說，中國傳統道德裡的謙遜，往往被誇大到如磐石壓人的地步，誇讚一個人謙遜，往往也就把他的個性棱角砍掉並將其創造力整個碾碎。我覺得自己和捷生在多年的磨練裡，有一點是相通的，那就是面對壓制個性的專制力量，不僅著眼於專制體制，更看透專制氛圍與專制人格，其實，對眼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，有時圈子的專制氛圍與浪人的專制人格，更猛於體制之虎，能自覺地對之抵制，從嚴格意義上保持住自己的人格清白，非常困難，卻絕不能放棄。

岩漿在地表下翻湧，這是耳熟能詳的比喻，所謂於無聲處聽驚雷，總盼望天際的陰雲至少能鑲上個金邊。但我覺得於捷生的文字，還是喻成在地底溶洞裡靜靜流淌的淨水更為恰切，它即使不會很快地滲入江海，卻總會在某一天，被掘井人開發為一個令後來飲者所思的甜源。

和捷生在一起，總不免時時縱情大笑，二十幾年前，記得是在安徽蕪湖賓館裡，竟至雙雙笑得岔氣，險些連袂就醫。那回同住一條走廊別房的同行事後頻問：你們究竟笑些什麼啊？而那時我和捷生同享一句口頭禪，就是——不必搞得那麼清楚！

說是失語，卻又忽然敲出了這麼多文字。啞然失笑。是的，不必搞得那麼清楚！

寫於北京綠葉居